



彭順強—— 生逢亂世 有種責任

這最好的時代，是最壞的時代；是信仰與懷疑、光明與黑暗、希望與絕望並行。如果說，這是亂世，那麼，彭順強筆下的人物，肯定是生逢亂世，而且投入世界，承擔了一份責任。對彭順強來說，書寫，是一趟旅程；愈書寫，愈發現自身與社會是連體的；愈看到自己視角的局限，也愈意識到要從個人生活走向社會……

撰文·藍雪 | 攝影·王婉薇

2015年1月，一個陰冷的下午，跟彭順強——一位作者、知識份子、神學教育工作者熱烈的討論，從納粹時代的潘霍華、印度的甘地、南非的曼德拉、美國的馬丁路德·金，一直聊到儒家、信仰、個人與群體、政治……

“寫作是我履行自己在這城市的信仰良心責任”

想到訪問彭順強，是在書海中發現他在2012到2014兩年之內，出版了一系列人物的書，而且愈寫愈「抗命」，先是《盧雲的誠與愛》、《潘霍華的順服與叛逆》，2014年7月前出版了引人注目的《公民抗命三巨人：甘地、馬丁路德·金、曼德拉》，難免讓人聯想，要配合一個什麼日子？「本來打算今年出版，但當時想，佔中隨時都會發生……還有，『七一』和書展，來了很大的動力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日以繼夜去完成。」

原定的「佔中」演化成「雨傘運動」，是始料不及。不管你對運動支持或反對，甚或只是茶餘飯後指指點點，卻彷彿沒有人能置身事外，有意識、沒意識的參與了。彭順強沒有例外，不過他一開始就有意識地選擇參與在理念上做一些鬆土的工夫。

「寫完盧雲及潘霍華後，有很大的啟發，特別是潘霍華，他讓我看見，政治是要批判的，現在有人出來說要佔中，就是對政治架構的批判，作為一個信徒，有責任做一些back up，讓人知道甘地、曼德拉、馬丁路德·金的非暴力抗爭。」

正要問，作為一個基督徒、神學老師，這些想法與行動算不算越界了？「馬丁路德·金、盧雲也非常讚揚甘地，他一定有些優點，值得我們學習，雖然他是印度教徒。我希望，我的信息不限於基督徒群體，而可以衝出教會，衝出教室。」結果這書真的由非基督教出版社出版，也進入了非基督教書店。



談到書寫的旅程，他做了一個簡單的註腳：「寫作是我履行自己在這城市的信仰良心責任。」這所謂責任，是如何摸索與發現？他最初在加拿大念的是工商管理，但他說，念工商管理不過是留學生的傳統，也因為爸爸是做生意的。後來讀心理學是希望解救集體創痛，「1989年六四之後，我回到香港，參加遊行，當日面對失望、創傷，痛苦很大。回到美國，修讀了心理學，希望

藉此醫治人、輔導人的心靈。」念心理學碩士的同時，也念神學。

他直說，念神學是為了「認識自己的信仰，也幫助其他信徒認識信仰」，定位好像有點高遠，但其實他的心意是回饋。少年時候信仰生命得到栽培，「到我生命成熟，也要栽培別人的生命」。畢業後，他選擇投身教育，在神學院當老師，並開始寫作。

“我由不太關心，到關心，到實踐……”

彭順強最初關心的是個人聖潔生活，對人的內在靈性發展深具興趣，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靈修傳統。書寫人物之前的《勇闖七重山》，把生命分成七個階段，「嘗試把天主教、基督教、聖經、心理學結合，探索如何面對人的發展，其實是一個屬靈旅程。」

但人的心靈始終難以獨立於一時或一室的安穩。「想從歷史的範圍收窄，看看靈修傳統中的領袖怎樣有血有肉，怎樣把靈性成分實踐出來。」

彭順強把他心目中的「靈修大師」一個一個的研究和書寫，結果發現：「他們對社會有深切的關懷，有很強的承擔感；由個人聖潔生活漸漸走出來，積極參與世界、批判、論政，甚至批評政府。」也許書本還沒有影響到讀者，卻先改變了自己。

「我由不太關心，到關心，到實踐，對社會承擔感愈來愈強。佔領時期，我多去了幾次，但我不是激進的人。」也漸漸意識到：「如果只從基督教、神學的視角看社會，或會容易抽離。」

“同樣重要的是改變制度”

彭順強首先選了二十世紀的靈修作家盧雲神父（Henri Nouwen）。原來他是盧雲的粉絲，而且他們二人都讀過心理學，幾乎是同時期做智障人士的服務（盧雲於1986年離開當時任教的哈佛大學，轉而投身於「黎明之家」，服務智障者）。在盧雲身上，彭順強特別體會到愛、和平、包容並不與批判對立。「盧雲反對當時美國政府參與越戰，認為那是不公義之戰；還有核能、人權種族等，盧雲都加以批判。」



「盧雲所提出的和平很像甘地，他的和平帶有批判，但不會使用暴力，馬丁路德·金帶領的遊行他也有參與。他有些朋友參加綠色和平，以武力阻止政府或私人機構破壞大自然環境，因而被捕，但他坦承，他沒有這份勇氣。」

至於潘霍華（Dietrich Bonhoeffer），則是由於他的知名度，「最初看他的《追隨基督》，沒想到潘的思想有這樣強的政治性、社會性。」潘霍華當年參加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，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失敗而被捕，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於集中營。



潘霍華對彭順強的啟發是，不但個人要參與社會，更要喚起群體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：「潘批判納粹時代的教會不問世事；作為信徒、甚至教會該如何影響那個時代，特別是對專橫政權的挑戰。主張不單與受苦的人一同受苦，像基督一樣，同樣重要的是改變制度，否則受苦的人只會繼續受苦。」彭順強對此非常認同：「要有策略地參與社會，從價值觀、結構問題著手；如果是結構讓你實行不了，就需要處理，教會更有責任去處理。」

寫《公民抗命三巨人》時，彭順強的信念更確定，而且設定了雙向的視角：基督徒進入世界，也把其他宗教帶回基督教群體，交流彼此深層的共同價值觀。彭順強在全書的終章比較了他們三人的共通處：忠於信念、非暴力抗爭、爭取制度的改變，卻不是與政府為敵。「他們都有強烈的宗教情操，寫甘地的時候，彷彿看耶穌的說話。」



不過，他覺得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或抗爭還是有分別的：「基督徒看參與不在於有用無用，而是在上帝眼中是否應該做；就算你不認同對方，也要愛他。最後的盼望在於上帝。」

“批判社會只是負面，正面是服務社會”

彭順強堅信一切從理念開始，書寫是理念的一端，但最終，理念如何跨到行動，個人如何邁向群體？

這段時間，彭順強在神學院開設「社會關懷與靈修」課程，延續他的關心，發揮他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影響。至於寫作，仍是會繼續，為的是喚起人的反省，特別是教會。作為理念反省後的實踐，彭順強再向社會工作探索。去年他報讀了社會工作碩士。「批判社會只是負面，正面是服務社會。社會工作的初衷包含兩個使命：關懷社會以及改革社會；社會工作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應社會，幫助分析社會問題。」這是他的信念，是否一如所願，還是未知之數。但也許重要的是義無反顧，堅持下去。

請他在書上簽名，他的寄語是：「願公義與憐憫，常與你和這城市同在。」公義如何爭取？是時代巨人的責任？還是我們每個人的一份承擔，哪怕只是一個微小的崗位？